

書法家夏壽田的風流韻事

王覺源

書名豔事同震一時

清末民初，被目為中國大書法家之一，與鄭孝胥等齊名的夏壽田，他是清末殿試出身的榜眼。那時的名器雖可貴，但在科舉時代，如果是一個庸庸碌碌的榜眼，縱令是一個狀元，也都算不了什麼。夏壽田這個榜眼之出名，還是由於他的「字」。他書法的知名度，當時的排行榜，當在鄭孝胥、陳寶琛伯仲之間。北京、上海的宣紙店（通稱南紙店），所存「筆單冊」中，夏壽田不是排名第一，也得列於第二，不會出第三名之外。有人說：使他書法揚名於海內的，又是他的「篆體」字，在清末民初，獨步全國。不僅此也，他的風流韻事——轟括了南北兩花魁，更轟動於一時。二者互相輝映，也助長了他的書法行情，僅略輸於鄭孝胥（民國二十二年，僑滿洲國成立，設偽都於長春，鄭任國務總理）。

明清兩代，書畫家之賣字賣畫者，多由宣紙店家經手，收取定單，銀貨亦由其代收代轉，宣紙店僅從其中收取一定的佣金而已。名書畫家經常的進賬，固然很有可觀；而宣紙店，除靠書畫家銷售其紙筆等之外，佣金亦常成為很大一筆收入。

這類宣紙店，凡京、滬通都大邑，皆有經營。或為分店，或為獨營，各地互相聯繫，聲氣相通，以廣招徠。除代名書畫家（書家比畫家多）買賣字畫之外，就是出售高級的文房四寶，特別是「宣紙」，一般低級的文具，則不具備。這些書畫家，又是必然的顧客。最有名的宣紙店，如榮寶齋、多寶齋、清秘閣等十數家，分店幾遍全國，一切都按傳統作法，規規矩矩，很難更易。

凡著名的宣紙店，每家都有一本很厚的全國名書畫家親自所訂的「筆單」——即壽屏、對聯、單條、招牌、冊頁、扇面、字畫類別，以及尺寸大小等的價目表。宣紙店則依照各項定價收款與交貨而已。「筆單」集之成冊，排名的先後次序，則由店家自己斟酌安排；店家的安排，則根據買者需要的行情作標準，也比較客觀。

平津一帶紅得發紫

在「筆單冊」中，由清末至民初，老一輩的書畫名家，如鄭板橋（燮）、清道人（李瑞清）、王一亭等先後凋零以後，筆單便已隨之而取銷。民國時代，正當行的書畫名家如鄭孝胥（福建鄉試解元）、劉春霖（狀元）、陳寶琛（同治進士）、夏壽田（榜眼）、鄭沅（探花）、溥心畬（小恭王），以及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譚澤闓等，不下數百人之多。賣字賣畫的人，固多翰苑名流；但有些作品並不高明，或因收件太多，不免胡亂塗鴉，粗製濫造。有很多非翰苑出身，僅藉前朝遺老號召者，雖不名家，間常有些作品，實不在名家之下。中國對日抗戰時期，任行政院參事兼業餘新聞記者，亦詩人之流的黃秋岳，也冒名畫家之一，且有「筆單」提出；後來因為出賣情報給日本人而被槍決。情報售價，雖比他的筆單訂價高出幾千百倍，終不免落得無恥漢奸的臭名與槍斃下場。

翰苑名流鄭孝胥、陳寶琛皆福建人，也都是清宣統皇帝溥儀的老師，書名亦隨其政治地位而提高。夏壽田在戊戌政變那年，雖中了殿試一甲第二名的榜眼，科名比鄭、陳都高，但他在清末並沒有什麼官職可與鄭、陳比美。民國時代，他却做了袁世凱大總統的近侍，洪憲皇帝的內史大

中 外 雜 誌

中臣，紅極一時，書法亦因而紙貴洛陽。有謂字畫純爲一種藝術品，不會因人因地而貴而賤，有人是不會深信的。如在香港，以前齊白石一張親筆扇面，隨便畫兩朵紅菊花，開價就要港幣千元；鄭孝胥一首對聯，日本人視同拱璧；夏壽田的字，在平、津、上海等地紅得發紫，在香港和海外，名則根本不揚，字也不易看到。

民國初年，北洋政府的幾個政治領袖人物，幾乎每人都有一些智囊、打手、侍從忠耿之臣。如段祺瑞有忠盡不貳的徐樹錚；張作霖有絕對服從的楊宇霆；馮玉祥有唯命是聽的鹿鍾麟；曹錕有「是我大本錢」的吳佩孚；黎元洪有守死勿去的阮斗瞻（忠樞）；袁世凱則有事事迎合的夏壽田。現在祇說夏壽田。

名門子弟賣字終生

夏壽田，字午詒，湖南桂陽縣人（湘南接近廣東），約生於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前後。離居山僻地區，却是一個書宦世家子弟。幼極聰慧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師長多以神童目之，循科舉正途求進，所至無不克。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，殿試中一甲第二名榜眼。其父夏菽軒，時正任陝西省撫臺，得報，陝文武百官爲一省疆吏作賀，幾乎轟動全省。但夏壽田於中榜眼之後，以賦性淡泊，不慕利祿，便挾其新寵（見後），急束裝返湘，與王湘綺諸名流遊，日惟以詩酒山水自娛，過其幽閒隱逸的生活，歷十餘年。直至民國二年，始經楊哲子（度）的敦勸，應袁項城之召赴京，開始其政治生涯。從此依附袁氏，處處迎合

項城。

夏壽田原爲王湘綺（見本刊第二三期）門下名弟子之一，才氣縱橫，涉獵頗廣；詩亦宗湘綺，出入漢、魏、六朝，晚年尤工。湘綺出任袁大總統的國史館長（楊度副之，實負責任），就是夏壽田與楊哲子代表袁氏懇請而來的。袁世凱背叛民國，洪憲稱帝時，湘綺則已經返湘；夏、楊則皆一時新貴，作了袁氏左右侍從之臣（籌安會六君子，沒有夏壽田）。夏壽田任「內史大臣」，時人稱夏太史；楊度被目爲宰相，人稱楊相國。項城帝制失敗，民國五年六月暴斃以後，夏壽田亦避禍至津，再赴大連、青島到上海，不再涉足政治，而以賣字終其身。大約在民國三十年前後逝世，年齡還不到古稀。

袁項城對夏壽田的書法，亦極讚賞，故袁氏當年的總統府和清華宮（北平南海懷仁堂）四壁所懸古今名家書畫，以夏太史所作者爲最多。直到國共兩黨在北平和談之年，據說仍懸存於壁間。

一堂壽屏兩千兩銀

清科舉制度，禮部會試中進士後，就有資格參加殿試，點翰林。點翰林的主要條件就是要館閣體的字寫得好，祇有湖南鳳凰人熊希齡點翰林獨例外，這是光緒皇帝的懷柔政策，特別原情；因爲他是「兄弟民族」——苗人，便不計較其書法，不過皇帝仍在他的試卷上批上「習字三年」四個大字。夏壽田出身翰林，字寫得好，是不成問題的；他的楷書，在中榜眼之前，已下

過一番功夫，自不必說。世人讚揚他的篆書獨步全國，却是他點翰林以後，加工致力的結果。到了晚年，自己却常說：「我篆書賣錢，但行書却勝過篆書；而草書則爲看家本領，不輕一試。」這意思就是說：他草書第一、行書第二、篆書祇算老三；易言之：行、草、楷、篆、皆其所長。有人說：這一說，或許適得其反，「不輕一試」，正是因爲太差勁的關係。識者獨謂：他的行篆，皆用篆法和隸法揉和而成，的確是用過深功的。有一段長時期，他在家專習小篆中的「鐵線」，大習其青銅器上的金文，後來寫金文之「散氏盤」，實爲時賢中所罕見。說他「獨步全國」，亦不算是過譽之詞。據其筆單所載，寫一部篆書如「多心經」，定價爲五百大洋；一堂壽屏，則爲二千兩銀子；在他自己或爲便宜，實已是寒家半世或一生之糧了。

紅粉侍候陪伴作書

夏壽田在當年上海的字畫市場，他筆單的定價雖相當高，但終未超過鄭孝胥。此爲客觀的評價，也是他在上海排行榜上，始終未能名列第一的原因。不過鄭孝胥的私生活比較嚴肅與隨和，在寫字的排場考究方面，却要略遜夏壽田一籌。

夏壽田之作書，無論在京、津或上海，都極考究排場。他的大書房中（另有小書房），設長案大毡，專作寫字用的，案上有筆筒如斗，中插各種大小毛筆數百枝；另一大方案則豎置各種各色大小圖章，彷彿碑林一樣。凡書畫家都是講究

圖章的。他的圖章，無一不是京、滬名家的傑作，尤其自寫的鐵線篆文，由名家刻製的圖章更爲名貴。與圖章同樣重視考究的，就是印泥。夏壽田所用的印泥，不是取之於坊間文具店，都是親自監督製練而成的。全以珍珠、瑪瑙加銀珠，和十年以上的蓖麻油，不斷春搗，搗歷多時，不滑不滑，成爲印泥中的極品，印蓋於宣紙或細絹之上，艷奪目，永遠不變顏色。

他新娶的姨太太——北里花魁，終日侍側，不事女紅，不營庶務，所負工作，惟寫字托紙、搗磨印泥、陪燈燒煙泡和餘興而已。鄭孝胥如何？我却不得而聞，因其官廳大，心別有所用，或不如此。在滿洲國成立之前，鄭孝胥的字，主要捧場者，即爲日本人，最多的收入，一年爲現銀十二萬。做了漢奸以後，字的聲價反而一落千丈。夏壽田正因爲沒有得到日本人的賞識，夏太史的字，在平、津、上海各地，却始終和他紙上所蓋圖章一樣，沒有變色。

當年殿試自信必中

夏壽田中榜眼，是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，也正是有名的戊戌政變，光緒被幽禁於瀛臺那一年。殿試第一名爲狀元，第二名爲榜眼，第三名爲探花，合稱爲三鼎甲，謂爲大魁，合金榜翰林皆稱爲天子的門生。夏壽田這次之中榜眼，有一種傳說：清例科舉殿試的發榜，午門傳臚大典的規矩，填榜是從第四名傳臚開始的，最後才填寫狀元、榜眼、探花三鼎甲。夏壽田不像一般舉子，試畢後即分途回籍，聽候京中傳報佳音

，他却是守候在京，等候發榜消息的。當填報三鼎甲首名姓「夏」的時候，便緊張起來，滿以爲是自己，及知爲「夏同猷」時，雖覺冷了一下，但仍很有自信的說：「榜眼、探花兩名之中，如果沒有夏壽田，那我夏某便要去跳北海了。」果然，填報第二名榜眼，又是姓「夏」時，他有把握，準知是自己，才放下心的急說：「一定是的，一定是的。」果然！

俗說：「科場莫論文」，「棘園自古多遺珠」。像夏壽田這樣有堅定信心的人，在科舉趣談中，從沒聽說過。夏壽田這時固然喜不自勝，他的父親夏叔軒當時正任陝西省的撫臺，兒子高捷的電報傳到長安，在國家名器不濫的時代，自然更是高興，並即時匯寄了三萬兩銀子至京，作爲兒子謝師及同年應酬之用，也替自己顯顯風光。

花國狀元風塵知己

科舉時代，各省趕赴京都會試的舉子離鄉背井，率多初離家門，爲免途中寂寞，並能互相照顧，便多結伴而行。當夏壽田與一班湖南舉人們取道長江，順流而下，到上海以後，在候輪北上天津赴京時，自然不免藉機遊玩一番。每人縱未腰纏萬貫，但赴京會試，原是家族間一大喜事，家長爲壯其行色，亦決不會蔽其私囊。一班青少子弟，雖盡非執袴，但落到花花世界的十里洋場，目迷五色、心猿意馬，自少不了探花問柳，去打茶圍、吃花酒。其時，上海會樂里正有一蘇州名妓剛剛大魁爲花國狀元（不詳其名），恰被

這羣舉人老爺（娼門不論客人年齡，一律稱老爺）在酒筵上碰着了，舉座無不驚爲天人。她不但姿色超羣出衆，而且口齒伶俐，說得個個開懷，舉座皆歡。

有位舉人老爺對花國狀元笑道：「在我們這批老爺之中，這回進京，那幾個會得高中？你且評評一下看！」那花國狀元便指着夏壽田道：「別人僕勿知，這位夏老爺，黑黑胖胖的，一定會高中哉！」在座皆舉人老爺，她獨舉夏老爺以對，私心似有所偏，不洽輿情。有人觸了霉頭，心雖不樂，在逢場作戲中，也不便見之於顏色。另一位舉人老爺祇好說：「如果夏老爺真個中了，我們便非逼他娶你不可，你怎麼樣？」那花國狀元立刻應聲道：「好，儂明天就取下燈來（上海樂戶門前都懸有花牌燈，夜晚燃燭其中），不做生意了，等夏老爺高中！」說做就做，次日，果然取燈，除了艷幟。

這正像賭寶一樣，的確是花國狀元成敗的重要關鍵。夏壽田是陝西夏撫臺的少爺，這張底牌或許早經洩露了。在花國狀元想來，不管夏壽田能中與否，中了，夏必感恩風塵知己之恩，會來娶；不中，夏亦必念她守死不變之情，會來娶她。總之，撫臺大人的兒媳婦，她是敲定了。一個風塵女郎，尙有何言？這實算來是不會輸的。

夏壽田有了翰林的資格，如果像一般翰林一樣，在京學干祿，至少可以做個翰林院的編修；但他收到夏撫臺三萬兩銀子之後，囊中飽滿，任其揮霍，便不作其他的想法，祇迫不及待的，藉口回鄉祭祖，專程到上海感恩風塵知己之恩，真個榜

眼娶了狀元做姨太太，隨帶回湘。同時，由於錢多了作怪，花了一千兩銀子，買了整套十二副象牙的活動春宮；這是一位京中名家的作品，與仇十洲的工筆春宮畫，有同等價值。仇畫工筆細膩，傳神毫端，顧春福譽為「醉心悅魄之作」，與這象牙作品，皆為藝術的結晶，供作藝術賞鑑，自無不可。倘落到色狼、登徒子的手中，必然改觀變色，作了閩中行樂的模擬圖了。

北里花魁作新姨太

夏榜眼中了以後，不在京中謀政治發展，却帶了姨太太——上海花國狀元回到家鄉湖南，過了十餘年的優遊名士生活。到了民國二年，始從楊哲子的勸，到了北京，依附於袁大總統。湘綺樓日記有一則諷刺的記載云：「夏榜眼又去討姨太太去矣。」實際是指他進京，做袁世凱的官去了。「後來，真是如響斯應，官做了，姨太太也討了。」

袁世凱當國，此時已開始毀法，陰謀帝制活動。夏壽田至京，與其同鄉楊哲子緊密勾結，同是新華宮裡贊助袁氏非法活動最紅的人。項城固視為智囊門士，依為股肱；即準太子袁克定亦俯首下交，視夏、楊為其心腹。此時的北洋政治，除形式上，由滿清變為民國之外，一切政治作法、社會陋習、腐惡舊俗，則全然未改。北京前門外的八大胡同與四城各大酒店，盡是北洋政府文武官僚政客富豪飲宴作樂的場所，燈紅酒綠，笙歌達旦，幾日無虛夕。夏壽田、楊哲子、袁克文等達官新貴，並所謂清流名士，則常藉詩文會友

的美名，每於華燈初上，必多集於韓家潭、百順胡同（蘇揚班集中地）、石頭胡同（北班中心），車水馬龍，另成一無法無天的神鬼世界。

夏壽田時以新華宮內史大臣之尊榮，同輩通稱夏太史，年方三十餘，不及四十；才華豪放，風流不減當年，更為一般政客名流所推重。其時八大胡同中「清吟小班」，有一蘇州姑娘，人稱花魁娘子，紅極一時。當時官僚、政客、豪紳、巨賈之追逐者多如附腥的蒼蠅，莫不以能作賣油郎為榮。夏太史終以摘花手段高人一籌，以袁朝新貴，更獲楊哲子的助力，得以獨佔花魁，北里娘子重入嬪，成了他的新姨太。時人指夏太史「囊括南北兩花魁」，即指上海的花國狀元（他的大姨太）與後來來的北里花魁娘子（新姨太太）來說的。如此豪情，風流冠南北，即無怪時人要側目而視，欣羨不已！

花雲仙子也嫁新貴

夏太史新娶的北里花魁，不但名重京華，北里稱艷，手腕能通天下地，交際應酬的本領，更能面面周到，因應自如；風韻雖足，姿色則終不及夏之大姨太太——花國狀元——遠甚，祇是新妝入時，舉止動人而已。據說：夏納新姬，還費了楊哲子幾番搥圓拉攏的功夫，而哲子之肯賣力，又另有其目的存焉。

楊哲子不甘向隅，獨我寂寞，當夏太史孀藏花魁之際，同時，他也娶了八大胡同中另一絕色蘇州姑娘，此即「新華春夢錄」小說中所說的花雲仙是也。花雲仙與花魁娘子同係蘇產，原極友

善，親如姊妹，居常一日不見，必遣人問訊。兩姊妹曾有互約：「花魁不嫁，雲仙亦永不從良。」所以楊相國欲娶花雲仙，必先替夏太史與花魁娘子上勁作合，夏太史成了功，楊自水到渠成。

北洋初年，十里南城的雙絕——花雲仙與花魁娘子，由楊、夏兩新貴，平分了春色。兩貴兩姝四美具，不但已使北里平康生色，也使袁朝新貴叫絕不已。花雲仙除具有花魁娘子的手腕外，更有連女人也着迷仰慕的姿色；當年便有不少的貴夫人、小姐和交際花草，即令是素來看不起姨太太的人，見了楊度的姨太太——花雲仙，也甘屈尊下顧，願與她結為契姊妹，學她的萬般儀態。

洪憲黑官風流半世

夏壽田以優異天資與滿腹經綸，挾榜眼之尊榮，原不難大用於世。夏叔軒撫臺或猶在夢想：夏氏第二代的撫臺，早日重見。無奈夏壽田一誤於遊戲花叢，貪戀溫柔，銷磨了遠志；再誤於沉溺鴉片，逍遙世外，便已趨於頹墮階段了。以前者言：不急於仕途發展，反急娶花國狀元回鄉，十餘年流連於富貴故鄉，忘掉歲月，乃不知已有民國了。美之者，謂為清高、淡泊名利；鄙之者，則謂為膏粱子弟的惡習，牢不可破。關於這點，現在自然都不值得討論了。民國二年，出山依袁，雖有幸做了袁世凱的「內史大臣」，與楊哲子輩，雖彈冠相慶，却是袁皇帝的黑官。黑官亦曇花一現之後，便繼起乏力了。

以後者而言：夏壽田之沉溺鴉片，固不知始自何時，大概不外源於腐敗的仕宦家庭，膏粱子

弟多所不免。或遊戲於攀花折柳之間，當時，鴉片已成爲待客應酬之必需，品此都不必究問，當也算是夏撫臺造就出來的——翰苑榜眼、黑鄉高士。當他在袁世凱時代，成了袁氏近臣之時，所需黑鄉糧食，自有人逢迎孝敬，如曹三爺（錕）所餽，每次動輒數十或百斤。夏太史黑糧充裕，便思增益其補身價值，使福壽膏成爲名副其實的福壽膏而珍藏之。其法將先生士熬煎成膏後，深埋於地下，使之化掉火氣而質更純，隔年取

出重煉，加上各種高貴補藥於其中，如道家之煉丹汞一樣。然後以各色不同的玉瓶磁瓶或玻璃缸分別盛之，貼上紅色標籤：「高麗參」、「吉林野參」、「安南肉桂」、「何首烏」，洋洋大觀，陳列滿櫥。

袁世凱洪憲帝制失敗後，夏壽田亦成爲被攻擊最力對象之一。京中無法立足，初遷天津，再移青島、大連，終定居於上海，過他遺老、寓公、名士兼賣字的生活，安閑自在，生計無虞。這

時亦常在猶大資本家哈同及地方貴紳門下作清客，哈同去世，喪葬多遵中國古禮的規矩，有一項請仕宦名流「點主」之儀，洋人亦愛附庸風雅，特別邀請到三鼎甲——狀元劉春霖、探花鄭沅、榜眼正是夏壽田，主持這一莊嚴的典禮。三人皆係上海賣字的名家，哈同之喪，僅此亦轟動了整個上海。事後，喪家則每人致送禮金萬元，出洋差一次，所費不過一兩小時，比賣字是強得多，祇惜機會可一不可再。

費著「民國人物新傳」序

王成聖

聖文書局隆重推出一系列的人物傳記，其特點爲夾敘夾跋，亦莊亦諧，內容求其真實，寓意求其深刻，立論求其持正公允。當今之世的傳記作品，大凡知名的人物，事蹟史料雖然比較多，出諸傳聞者亦不在少，而且真偽並見，參差不一，時間一久，很難選下適切定論。如或渲染附會誇張，繪形繪聲，那就成爲小說家言；如或歌功頌德，曲爲塑造；如或肆意譏評，譁衆取寵，那就失去真實，毫無價值可言。因此，出版人物新傳，必須克服蒐集資料和運用取舍的困難，堅持公正平允的立場論點，避免誇張塑造的描寫方法，才能產生理想的作品，具備流傳永久的價值。

名作家費雲文先生，自民國六十二年二月起，迄六十五年三月，曾在「中外雜誌」發表一系列有關戴笠事蹟的篇章，頗獲好評（已彙編爲「戴笠新傳」問世）。自民國六十五年十月起，迄

七十一年十月，費先生又陸續在「中外雜誌」發表吳佩孚、汪精衛、張靜江、陳布雷、胡宗南、湯恩伯、梅蘭芳、孟小冬等人的傳記，風格高雅，取材平實精要，就事論事，婉轉敘述，不誇張附會，不蓄意塑造；並且執簡馭繁，掌握重點，結構完美，條理分明，文筆暢達而生動，詞意懇切嚴謹。

一般描述戰史的，往往限於資料來源，對戰役的規模，或者僅能及於一隅的戰況，而忽略了整體的關係和影響；或者在戰果和地域名稱方面，與事實有所出入。費先生畢業於陸軍參謀大學，有軍事學養，能廣爲蒐集資料，多方參證，並披閱圖籍，就戰術觀點，研考其真實性、可能性。敘述簡明精到，使人一目了然，絕無繁瑣支蔓之處。如「細說張國燾」中的「大別山剿共」、「當代名將邱清泉」中的「徐蚌會戰」兩章即爲

顯著例證。

費先生寫史事與人物，立論公允，文筆流暢自然，毫無牽強堆砌之處。春秋筆法，一字褒貶，確中肯綮。如汪精衛原爲黨國要人，吳佩孚本是直系軍頭，但因晚節不同，而有不同的結局。費先生都能一子以指明，並作比較。再如中共首要張國燾的來歸，有人以爲中央未能善加利用其分化中共，打擊中共。費先生却明白指出：「張國燾他和中共頭頭的爭執，是政治路線之事，反對的是毛澤東、張聞天等人的陰險狡詐，而不是從根本上反對馬列共產主義，他之所以脫離中共，跑到武漢，是怕生命受到迫害，不是想投誠中央，反擊毛澤東。」都是精闢的論點。

最近「中外雜誌」應讀者的要求，將上述費先生的十二篇大作，編爲「民國人物新傳」專集，交由聖文書局出版，徵序於余。深感這些文章，確係很難得的史評佳作，尤其欣聞出書之日，正逢費先生七秩誕辰。故樂爲之序，並以此爲費先生壽！